

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述評

趙殿紅

[摘要] 澳門是一個宗教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活標本，但迄今為止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除了媽祖研究成果相對豐富之外，各大宗教及“民間宗教”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成果較為零散，主要以考證源流、梳理史實為主，同時較為注重宗教的“傳播與交流”研究範式，探討澳門與內地宗教信仰的互動關係，較少從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角度研究宗教信仰與華人社區組織、族群凝聚力、生產生活方式等的關係，從而挖掘澳門華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內涵。未來，建議從以下方面推動相關研究：首先，深入探討澳門華商熱衷組建的以華人廟宇為中心的“神緣性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其次，將澳門華人的宗教信仰置於中國華南地區宗教場景中進行考察；再次，研究明清時期澳門從宗法社會向商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華人各種宗教信仰間的衝突與融合問題；最後，研究明清時期華人宗教信仰問題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澳門的延續、堅守與推陳出新的關係。從既有學術積累再出發，將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與廟宇功能的研究推向深入，豐富和完善“澳門學”的學科內涵，是相關領域學者們的共同使命。

[關鍵詞] 明清時期 澳門 華人 宗教 信仰

澳門是一個“群神共舞”的社會，一如其混合共融的人種與文化。中國傳統宗教如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所謂“民間宗教”，^①與外來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等和諧相處，構成澳門華人五彩斑斕的信仰世界。吳志良、鄭德華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下編第一章“多元並存的宗教信仰”，^②對澳門的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等中國宗教信仰與壇廟

作者簡介：趙殿紅，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唐廷樞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① 關於中國的“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目前尚無公認的、明確的定義，但在世界範圍內有許多討論，觀點各有所長。西方研究較早，從20世紀初的荷蘭人高延（J. J. M. de Groot）、法國人葛蘭言（Marcel Granet），到當代美國學者凱薩琳·貝爾（Catherine Bell）、柯若樸（Philip Clart）、魏樂博（Robert P. Weller），以色列學者夏維明（Meir Shahar）等，都對中國“民間宗教”的內涵和外延作了深入闡述；中國當代學者烏丙安、蒲慕洲、李亦園、姜彬、呂大吉、金澤、王銘銘、葛兆光、路遙、葉濤等，也在借鑑與延伸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對中國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影響深遠。參閱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其中，譚世寶、胡慧明對澳門“民間宗教”的範疇和歷史作了評析，見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第187—242頁。

^② 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宗教，以及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等外來宗教作了通論性敘述，全面介紹了澳門的宗教生態。

明清時期，澳門華人人口一直佔絕對多數，鴉片戰爭以後，澳葡政府加強殖民統治，強力拓展城界，加上大量華人為避內地禍亂而移居澳門，使華人人口比例迅速增加至九成以上。晚清澳門華商崛起，華商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參與和貢獻，直接推動了晚清澳門向近代化乃至現代化的過渡。^①據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海峽兩岸暨港澳有關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的論文約有300篇，涉及專題有人口、家族、社會階層、華人經濟形態、社團組織、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政治思潮等，其中“宗教信仰”部分約有100篇。^②可見關於澳門華人社會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對宗教信仰的關注度相對較高。

一、史料與專著

關於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特別是古代部分，近年研究主要得益於史料的發現、整理與應用。如湯開建對明清時期澳門問題中文檔案文獻、譜系資料的梳理與研究，金國平對葡文史料的翻譯與整理，譚世寶對澳門碑刻鐘銘的整理與研究，章文欽的詩詞研究，陳煒恆的器物研究，施議對的文字學（如楹聯）研究，姜伯勤對經幢文獻的發現等等，為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打下了扎實的資料基礎。

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人初識遙遠的中國，從王室成員到商人與傳教士，急切地希望瞭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爾（Dom Manuel）詔令海軍將領薛奎羅（Diogo Lopes de Sequeira）遠征馬六甲，向他發出了具有綱領意義的指示：“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Chijns）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炮？他們穿着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教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③

以此為起點，東來的商人和傳教士致力於觀察和記述華人信仰和風俗習慣，留下了不計其數的珍貴史料。如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葡萄牙人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遠遊記》（*Peregrinação*）等。儘管因當時的條件所限，加上基督信仰至上所形成的偏見，這些作品對中國記述的真實性、客觀性、準確性都大打折扣。但無論如何，它們既是西方人瞭解中國信俗的開始，也是中國人回望歷史的重要補充和參照。

①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 林廣志、陳文源：《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社會研究述評》，《港澳研究》（北京）2014年第1期。

③ *Alguns Documentos do Arqu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 Navegações e Conquistas Portuguezas*, pp. 194-195, 轉引自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錢江譯，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36頁。

路遙等2012年出版《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其中有譚世寶、胡慧明撰寫的《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①文中“涉及澳門‘民間宗教’研究的起源與發展”部分，對早期進入澳門的西洋商人、傳教士對華人信俗的考察和報告進行了梳理和評價。該文認為，19世紀的研究以西人為主，主要有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國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等；20世紀60—80年代，多為土生葡人和傳教士學者，亦有澳門本土人士，主要有王文達、土生葡人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葡萄牙學者安娜·瑪里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葡萄牙神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美國學者胡紀倫（César Guillen-Nuñez）、葡萄牙人類學者路易（Rui Brito Peixoto）等。文章分析了該階段研究之“非歷史的錯誤方法與觀點”，並加以批評糾正。對1990年代以來的研究，該文列舉了美國學者喬納森·彼特（Jonathan Porter）、中國學者鄭煒明、姜伯勤、章文欽、黃曉峰、徐曉望、譚世寶、何建明等人的成果，認為“1990年代以來的有關研究承接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趨勢，既有相當多學者仍然無意或有意地繼承甚至維護和發展了非歷史的錯誤方法與觀點，也有學者用嚴格的歷史考證方法，系統收集、整理、挖掘新舊資料，務求去偽存真，探討澳門開埠以來四百多年歷史文化的真相，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觀點”。^②儘管該文回顧的是澳門“民間宗教”的學術史（事實上論述所及也包含了佛教和道教），但作為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的主體部分，對理解其他宗教信仰的研究史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2014年澳門理工學院出版文兆堅編著的《澳門研究書目提要》，^③其中第八章“宗教”部分收錄了13本專著，包括黃兆漢、鄭煒明的《香港與澳門之道教》（1993），鄭煒明、黃啟臣的《澳門宗教》（1994），徐曉望、陳衍德的《澳門媽祖文化研究》（1998），何建明的《澳門佛教——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1999），姜伯勤的《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1999），李志剛的《基督教在澳門》（2006），霍志釗的《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從“單一”到“多元混融”的變遷》（2009），吳炳鈺、王忠人主編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2009），童喬慧的《澳門土地神廟研究》（2010），梁潔芬的《雙地記（教會篇）：香港和澳門天主教會》（2010），吳炳鈺、王忠人主編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續編》（2011），鄭煒明、陳德好編著的《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2013），胡國年的《澳門哪吒信仰》（2013）等。這些專著已經涵蓋了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的基本層面，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已經出現於澳門宗教研究領域當中。

上述成果以外，在專著方面，還有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1999），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2006）、《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2011），陳煒恆《蓮峰廟史乘》（2008）、《澳門廟宇叢考》（上下卷，2009）等考據型論著，為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研究發掘了不少文字資料和考古材料。

① 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242頁。又有譚世寶、胡慧明：《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澳門廟宇神祇研究述評》，《民俗研究》（濟南）2010年第2期，其內容與《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20世紀60至80年代的研究”大體相當。

② 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242頁。

③ 文兆堅編著：《澳門研究書目提要》，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4年。

在媽祖信仰研究方面，除上述書目以外，還需補充林明峪的《媽祖傳說》（1988），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出版的《媽祖文化研究——第一屆媽祖文化研究獎得獎作品集》（2005），徐曉望的《媽祖信仰史研究》（2007），徐曉望的《閩澳媽祖廟調查》（2008），李向玉、鄭煒明、胡柱鵬主編的《“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等論著。由此可見，關於澳門媽祖信仰的研究已是相當充分。

二、佛教研究

蔡鴻生在《清初嶺南佛門事略》（1997）中指出，嶺南地區是中國佛教的“濱海法窟”，“嶺南佛門產生於濱海地域，源遠流長，梵僧的弘法和寺院的創建，早在2世紀中期就開始了。進入唐宋時代，新興的南宗禪獨領風騷數百年。到明清之際，名剎林立、高僧輩出，已經與滇南和江南鼎足而三，成為遺民逃禪的著名淵藪了……從唐代到清代，從粵北到粵東，嶺南佛門的發展史，是與文化交流和社會變遷連在一起的。譯經傳入新觀念，佛門風尚打上海洋烙印，乃至僧徒的社會類型，等等，都是濱海地域的產物。海洋作為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既影響俗界，也影響僧界”。^①澳門地屬嶺南，明清之際嶺南佛教史上的市井僧、流放僧以及佛門的遺民潮等，也對澳門佛教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因此，該書也是研究澳門佛教歷史的重要參考書。

明天啟三年（1623），廣州長壽寺的循智法楷法師“斥衣鉢資”建觀音堂，成為澳門最早的佛教寺院。據王文達的研究，觀音堂的建立緣於澳門望廈村閩潮居民的觀音信仰。^②康熙三十一年（1692）成鷺首次遊澳門時，觀音堂已改稱“普濟禪院”，應與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為南海觀世音道場浙江普陀山的主剎賜額“普濟禪寺”有關。^③普濟禪院奉石濂大汕禪師（1633—1705）為祖師，稱其為“太祖太老和尚”，其“大汕宗風”得以世代弘揚。

姜伯勤的《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1999）對大汕禪師的生涯、交遊、詩學與禪學、藝術造詣作了通達詳備的考述，^④同時指出，清代澳門最著名的佛教寺院為以下三大禪林：普濟禪院（觀音堂）屬廣州長壽寺系，其“大汕宗風”繼承了曹洞宗壽昌系覺浪道盛的宗風，並可追溯到更早的臨濟宗憨山德清的影響；蓮峰廟屬鼎湖山系，繼承了禪淨律合一的無異元來所傳的道丘棲壑及弘贊在慘的宗風，可追溯到臨濟宗元覺離幻所傳之成鷺跡刪的影響，晚近亦由普濟禪院住持管理；媽閣廟內的正覺禪林，由普濟禪院禪僧管理。^⑤

何建明的《澳門佛教——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1999）側重論述晚清以後澳門佛教的發展及其與內地佛教的關係，探討了澳葡政府管理之下澳門佛教發展的特性。^⑥該書是第一本以“澳門佛教”命名的專題研究著作，基本上理清了澳門回歸祖國之前佛教的發展歷程。惜乎本書資料發掘比較單薄，幾乎沒有涉及佛教在澳門發展的獨特性及其在澳門錯綜複雜的宗教生態中

① 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頁。

②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

④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⑤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606頁。

⑥ 何建明：《澳門佛教——澳門與內地佛教文化關係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的位置，例如，佛道相融、多神共祀是澳門華人宗教的一大特色，該書並沒有對此加以論述。

論文方面，1993—2002年間，姜伯勤主要以澳門文化局主辦的《文化雜誌》為園地，發表了數篇關於大汕禪師、普濟禪院、蓮峰廟等的重要文章，這些文章亦是上述《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的部分章節。^①2003年，姜先生又發表《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補考》一文，該文據新見資料續作考證：據錢澄之《田間詩集》，發掘出大汕賣出自己的繪畫作品周濟清初遺民志士的史料；又分析了現存廣州光孝寺中大汕1692年所作碑文。文章指出，碑文與澳門普濟禪院中現存之“大汕宗風”的牌坊一起，成為大汕在廣州和澳門弘揚中華文化傳統的有力象徵。^②

譚世寶在澳門媽祖信仰、民間宗教、廟宇碑刻鐘銘考證方面用力頗勤，除上述《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等專著外，^③還撰寫了數篇有關澳門佛教歷史的論文，主要論述了澳門三大古禪院的歷史源流及其與內地的關係，辨析澳門蓮峰廟的歷史傳說及新見史料等。^④

1999年，澳門《文化雜誌》總第38期（春季刊）同時刊載了何建明的三篇文章：《略論清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以普濟禪院為主的個案研究》、《觀本與澳門近代禪淨佛教的傳入和發展》、《竺摩法師與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內容與其專著《澳門佛教》部分章節大致相當。同年，華方田也在北京發表四篇有關澳門佛教的通論性文章：《澳門佛教一瞥——澳門的佛教宗派》、《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澳門佛教與民間宗教》、《澳門的佛教組織》，^⑤內容大體上以介紹當代佛教為主。

三、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

道教是多神宗教，與“民間宗教”關係最為密切。關於兩者的聯繫與區別，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大熱點。^⑥在澳門，道教與“民間宗教”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一方面，與中國內地相比，澳

① 主要有：《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3、14期；《大汕禪師的澳門南海航行與唐船貿易圈中禪宗信仰與媽祖禮拜——兼論17—18世紀之交唐船海客的宗教倫理》，《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澳門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澳門蓮峰廟與清初鼎湖山禪宗史——新見史料〈澳門蓮峰廟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研究》，《文化雜誌》（澳門）1999年總第38期；《澳門普濟禪院所藏大汕自畫像及大汕廣南航行與重修普濟禪院的關連》，《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2期。

②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補考》，《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03年第2期。

③ 分別於2006、2011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 主要有《澳門三大古禪院與內地的關係》，廣東省社科院、中國社科院等聯合主辦“澳門與內地關係研討會”提交之論文，珠海，1999年11月；《澳門佛教與民間宗教》，鄧開頌主編：《澳門通史簡編》第十六章（華方田協助撰寫），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澳門三大古廟之歷史源流新探》，《文化雜誌》（澳門）2002年總第42期；《澳門蓮峰廟碑刻鐘銘的一些新發現》，《文物》（北京）2004年第12期；《蓮峰廟的一些歷史傳說及所見的“文物”之去偽存真》，《文化雜誌》（澳門）2003年總第46期。

⑤ 華方田：《澳門佛教一瞥——澳門的佛教宗派》，《世界宗教文化》（北京）1999年第3期；華方田：《澳門佛教的起源與發展》，《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華方田：《澳門佛教與民間宗教》，《中國佛學》（北京）1999年第4期；華方田：《澳門的佛教組織》，《世界宗教文化》（北京）1999年第4期。

⑥ 參見郭武：《道教與民間宗教關係綜述》，《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001年第12期。

門歷史上華人宗教信仰相對自由寬鬆，多種信仰共存，相融較多而衝突較少；另一方面，澳門地方狹小而廟宇眾多，且“多神並祀”的現象十分普遍。

道教信仰傳入澳門，最遲在南宋的紹興年間，因當時信奉三清、魯靈光、玄武、天后、東嶽大帝、城隍、康王神等道教神仙的崇拜活動已遍及香山地區。及至元朝，道教所供奉的神祇，如譚公、洪聖爺、文昌帝君、關帝、北帝、城隍等崇拜都見於澳門。鄭焯明在與黃兆漢合著的《香港與澳門之道教》中認為，早期澳門道教的代表主要有三：一是媽祖閣廟，二是三巴門的呂祖仙院，三是純陽派信善壇。^①黎志添則撰文研究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文章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澳門由正一派火居道士開設的三大喃嘸道館是陳靜修道院、吳慶雲道院和陳同福道院；而在清代廣東地區流行的火居道館，早於清咸豐年間在澳門境內已經存在。^②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現在澳門的道教團體可歸納為道教廟宇、全真派壇堂及正一派散居道院三個類型。

2011年，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兼融全真和正一兩派風格，這種兩派共融的現象在各地道門中頗為罕見，亦成為富有澳門本土特色的宗教音樂。至今澳門保留昔日嶺南正一派及全真派科儀音樂大大小小道曲達500多首，在全國各地名冠前列，具有曲目數量多、體裁樣式豐富、腔體結構完整、序曲獨特、重視敲擊樂器、本土氣息濃郁、嚴謹恪守傳統等特點。吳炳鈇、王忠人主編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及其續編對這些樂曲進行了整理和記錄。^③道教文化方面，黃鴻釗的《澳門道教文化志略》簡要梳理了澳門道教廟宇、信俗及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貢獻。^④

鄭焯明認為，“整個澳門地區，其實是一個屬於道教系統的媽祖信仰圈”。^⑤對此，譚世寶有不同看法，認為“明清時期中國漢族地區的宗教，充其量只可以說是以儒家的官方祀典為主導的多神多教並存的多元‘祭祀圈’或‘信仰圈’，不應也不可能把其中存在多元信仰的某一地區，說成只是某一宗教的某一神明的信仰圈”。^⑥

據譚世寶統計，不計菩提禪院和功德林兩座相對最正統的佛寺和行會及慈善團體的龕堂，澳門約有40多個社區寺廟。以主祀觀音和娘媽（媽祖）的最多，8個寺廟主祀觀音，6個主祀娘媽；供奉土地和關帝的廟各有4個；主祀康公、哪吒、北帝、譚公、洪聖大王的各有2個；主祀城隍、醫靈大帝、石敢當、三婆、女媧、鍾馗、劉伯溫、先鋒楊爺等小神的各1個。除主神外，澳門寺廟還有大量同祀和寄祀的神像，或在主殿旁邊另起殿堂，或在同一殿堂另立神龕，但更多的是在同一龕壇上於主像周邊添加其他神像。主神和同祀神之間，沒有上下或從屬關係。民間信仰裏的神，有些分掌一定的神職，如醫靈、城隍；有些與地域族群有關，如康公、楊爺；有些是超地域與族群的信仰對象，如觀音、天后；還有行業神等。不論寺廟最初以哪一類神作主神，其他類神都可因信徒需求而被供奉在一起，例比如望廈康真君廟同祀媽祖，蓮峰廟原主祀媽祖而同祀觀音

① 黃兆漢、鄭焯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

② 黎志添：《澳門吳慶雲道院的歷史變遷——十九世紀以來澳門正一派火居道士研究》，吳炳鈇、王忠人主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澳門：澳門道教協會，2009年。

③ 吳炳鈇、王忠人主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澳門：澳門道教協會，2009年；吳炳鈇、王忠人主編：《澳門道教科儀音樂續編》，澳門：澳門道教協會，2011年。

④ 黃鴻釗：《澳門道教文化志略》，《文化雜誌》（澳門）2004年總第50期。

⑤ 黃兆漢、鄭焯明：《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第75頁。

⑥ 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9頁。

等眾神。^①以下分述各信仰之研究：

（一）媽祖信仰

如前所述，澳門媽祖信仰是澳門“民間宗教”中研究最為充分、參與學者最多的領域。1995年4月，澳門文化研究會與澳門海事博物館聯合主辦“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會議極大地推動了澳門乃至世界其他華人地區媽祖信仰的研究。會議上舉行了李獻璋著、鄭彭年譯的《媽祖信仰研究》首發式，^②三年後又出版會議論文集《澳門媽祖論文集》（劉月蓮、黃曉峰主編）。^③2005年，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出版《媽祖文化研究——第一屆媽祖文化研究獎得獎作品集》，收錄了10篇論文。

徐曉望對澳門媽祖信仰歷史及文化論述最多，出版專著3本：《澳門媽祖文化研究》（1998年，與陳衍德合著）、^④《媽祖信仰史研究》（2007）、^⑤《閩澳媽祖廟調查》（2008），^⑥其他論文20餘篇。其中，《清代官府祭祀天后儀禮研究》通過分析清代多篇有關祭祀媽祖禮儀的規定，詳細敘述了清代地方官對媽祖的祭祀儀禮；^⑦《澳門媽祖閣碑記與清代泉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根據在澳門媽祖閣發現的兩塊碑刻，討論了清代澳門與泉州之間的茶葉貿易與鴉片走私；^⑧《澳門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教的兼融》探討了澳門歷史上媽祖崇拜與天主教聖母崇拜的相互融合；^⑨《論媽祖與中國海洋文化精神》從文化哲學角度分析媽祖文化與中國海洋文化精神，將媽祖信仰視為東方海洋文化的代表，與西方海洋文化的代表神希臘神話中的海神波塞冬進行比較研究，頗有新意。^⑩1995—1998年，徐曉望獲澳門基金會專項資助，研究澳門媽祖文化，於1998年出版《澳門媽祖文化研究》，從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等多角度探討了澳門的媽祖信仰，並對澳門媽祖信仰進行了100份問卷調查。1999年以後，徐曉望更將研究視野擴展到閩台地區及海外華人圈的媽祖信仰，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2008年發表《澳門的媽祖信仰》，對澳門媽祖閣的始創年代、福建海盜嚴啟盛與澳門開港的關係、媽祖閣的歷次重修、蓮峰廟等其他奉祀媽祖的廟宇、媽祖信仰與澳門居民的社會生活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⑪

對於澳門媽祖閣的始建年代與三大廟宇（媽祖閣、普濟禪院、蓮峰廟）之“官”、“私”屬性問題，徐曉望、譚世寶等學者進行了長期的討論。^⑫徐曉望認為，媽祖閣的始建與福建海盜嚴

① 吳志良、鄭德華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澳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74—175頁。

② 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鄭彭年譯，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

③ 劉月蓮、黃曉峰主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

④ 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

⑤ 徐曉望：《媽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2007年。

⑥ 徐曉望：《閩澳媽祖廟調查》，澳門：澳門中華媽祖基金會，2008年。

⑦ 徐曉望：《清代官府祭祀天后儀禮研究》，劉月蓮、黃曉峰主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1998年。

⑧ 徐曉望：《澳門媽祖閣碑記與清代泉州與澳門之間的貿易》，《南洋學報》（新加坡）1995年第50卷。

⑨ 徐曉望：《澳門天后聖母與中西宗教的兼融》，《歷史月刊》（台灣）1997年第4期。

⑩ 徐曉望：《論媽祖與中國海洋文化精神》，《福建學刊》（福州）1997年第6期。

⑪ 徐曉望：《澳門的媽祖信仰》，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

⑫ 參見徐曉望：《緒論：媽祖信仰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媽祖信仰史研究》，福州：海風出版社，第11—13頁；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238頁。

啟盛有關；三大廟宇不是官廟，而是民間公產，受到官府保護，有時被官府借為公用。^①譚世寶則認為該廟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由太監李鳳等官員所建，三大廟宇為官督商助的闔澳官公廟宇。^②對廟宇屬性問題，金國平、吳志良從澳門廟宇的歷史發展演進出發，認為媽閣廟經歷了從小廟到大廟，從私廟到官廟的發展過程。^③

章文欽對澳門媽祖閣與媽祖信仰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角色進行論述，發表了數篇有分量的論文。主要有《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④《澳門媽祖閣與中國媽祖文化》、^⑤《媽祖閣與澳門媽祖信仰》、^⑥《澳門的航海保護神崇拜與中西文化交流》、^⑦《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等。^⑧澳門多元文化共存的环境，使澳門的媽祖信仰呈現出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色，郁龍余撰文《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闡釋了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的關係。^⑨

此外，陳衍德對媽祖信仰與商業經濟及漁業經濟的互動關係作了探討；^⑩石奕龍則分析了澳門媽祖信仰形成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原因；^⑪吳宏岐從歷史地理學視角探討澳門媽祖信仰的歷史變遷及空間擴展，並闡釋了媽祖信仰與其他信仰的交融；^⑫陳樹榮從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入手，再次深入探究了澳門媽祖文化的發展歷史；^⑬李天錫則撰文比較了香港和澳門兩地媽祖信仰的異同。^⑭

田若虹《近二十年來以媽祖信仰為核心的“媽祖文化圈”研究》根據人類學“文化圈學派”的理論，^⑮將媽祖信仰分為媽祖故里（福建莆田湄州島）、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及海外等五個“媽祖文化圈”，認為媽祖信仰已成為一種跨國籍、跨地區的民間信仰，媽祖文化亦已上升為人類傳承文明、發展進步的世界性課題，媽祖則更多地被作為聯結世界各地華人的情感紐帶。

① 徐曉望：《澳門的媽祖信仰》，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

② 譚世寶：《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學術研究》（廣州）1996年第9期。

③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媽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早期澳門史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 章文欽：《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⑤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⑥ 章文欽：《媽祖閣與澳門媽祖信仰》，《學術研究》（廣州）1996年第9期。

⑦ 章文欽：《澳門的航海保護神崇拜與中西文化交流》，《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

⑧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劉月蓮、黃曉峰主編：《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

⑨ 郁龍余：《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文化雜誌》（澳門）1993年總第13、14期。

⑩ 陳衍德：《澳門商業經濟與媽祖信仰》，《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總第33期；陳衍德：《澳門的漁業經濟與媽祖信仰》，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陳衍德：《媽祖信仰與經濟文化的互動：澳門和閩南的比較》，《海交史研究》（泉州）1997年總第32期。

⑪ 石奕龍：《關於澳門媽祖信仰形成問題辨識》，《文化雜誌》（澳門）2003年總第49期。

⑫ 吳宏岐：《澳門媽祖信仰的形成、擴展及其與中西宗教的交融》，《海洋史研究》（第八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⑬ 陳樹榮：《澳門媽祖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從媽閣廟石殿神龕“萬曆乙巳四街重修”碑記談起》，《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⑭ 李天錫：《香港與澳門媽祖信仰比較研究》，《莆田學院學報》（莆田）2009年第16卷第1期。

⑮ 田若虹2006年12月在澳門科技大學進行海洋文化交流時所作學術報告。

2011年，《澳門研究》雜誌總第63期發表了兩篇有關媽祖信仰的重要文章，一是德國學者普塔克（Roderich Ptak）撰寫、肖文帥翻譯的《海神媽祖與聖母瑪利亞之比較（約西元1400年—1700年）》；^①二是林其泉、高志峰撰寫的《從澳門媽閣廟看媽祖信仰傳播以及媽祖習俗》。2013年，《澳門研究》總第69期又發表徐曉望的《關於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再認識》，對有關澳門開港與媽閣廟起源的學術爭議進行了再次梳理，對福建漳州海盜嚴啟盛與澳門開港和媽閣廟建立的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實際上是其早前兩篇文章《福建人與澳門媽祖文化淵源》（1997）、《嚴啟盛與澳門史事考》（2006）觀點的延伸。

（二）觀音信仰

根據印度學者的考證，觀音最初是中東地區一位神的信仰，後來傳到印度，在佛教中演化成了觀音，作為慈悲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佛教影響最廣的一位菩薩。後來，觀音信仰也影響到了道教，很多道觀開始供奉觀音。需要注意的是，佛教各個派別都很推崇觀音，藏傳佛教布達拉宮就是觀音的道場。觀音、媽祖及天主教的聖母信仰，並列為澳門的三大女神信仰。明天啟三年所建觀音堂（澳門普濟禪院前身），即緣於澳門望廈村閩潮居民的觀音信仰。1967年，葡萄牙人類學家亞瑪羅（Ana Maria Amaro）發表長文《觀音古廟》（“O Velho Templo de Kun Iâm em Macau”），是第一篇專題研究澳門觀音信仰的文章，也是較早用人類學方法對澳門觀音古廟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對後來的研究產生不小的影響。^②

觀音與媽祖“同道不同源”，兩種信仰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台灣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林媽媽的碩士論文《觀音與媽祖的相關性研究》認為，在所有女神信仰中，觀音與媽祖的角色最為多變，而以其時空之不同，兩者之神性卻有諸多重疊，連教化眾生的目的也殊途同歸。^③這種重疊性在澳門的表現尤其明顯，如蓮峰廟就同時主祀觀音和媽祖。

澳門華人寺廟中，主祀或同祀觀音者最多，可見觀音信仰在澳門與在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受歡迎。澳門三大古廟中的兩座——普濟禪院和蓮峰廟都以觀音為主神，但除了前述姜伯勤對普濟禪院、蓮峰廟的研究，以及陳煒恆《蓮峰廟史乘》、^④王文達《蓮峰廟史乘》外，^⑤有關澳門觀音信仰的研究卻非常少，需要引起學界的關注。

（三）關帝信仰

在華人傳統的信仰世界中，觀音與關帝最為深入人心。無論是社區神廟、商戶神龕還是家庭供奉，最常見的便是觀音與關帝。在澳門華人心目中，關帝具有多重角色，既是保佑一方平安的戰神，又是講求義氣、和氣生財、公平交易的財神。澳門華洋雜處，利益交錯，關帝信仰對穩定社會人心起到重要作用。澳門現有主祀關帝的廟宇4座，其中以建於清雍正末乾隆初的關帝古廟（三街會館）最具影響力。

2012年9月8日，澳門大學舉辦關帝文化國際研討會。會上發表了6篇主題演講，分別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與關公信仰的重建”（胡小偉）、“由台灣的‘高雄關帝廟’之年度祭典活

① 該文後來又收入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② 參見譚世寶、胡慧明：《澳門“民間宗教”研究述評》，路遙等著：《中國民間信仰研究述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4頁。

③ 林媽媽：《觀音與媽祖的相關性研究》，台灣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④ 陳煒恆：《蓮峰廟史乘》，澳門：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2008年。

⑤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

動探討現代人對關公崇拜的轉變”（康詩瑀）、“關公崇祀源流述略”（呂宗力）、“《三國演義》中呂布與關羽的對比研究”（梅紅）、“讓中華關帝文化傳承永恆”（朱正明）、“武聖關公”（區秉光），並沒有一篇有關澳門關帝信仰的專論。可見，與觀音信仰一樣，澳門關帝信仰研究基本處於空白，需要引起學術界重視。

（四）土地神信仰

土地神是古代農業社會神靈崇拜意識的產物，也是我國民間信仰中的一個重要神祇，其影響廣泛，遍及城市鄉野。同時，民間信奉的土地神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澳門除了有主祀土地神的廟宇外，無論大小店鋪、酒店，還是小巷深處的普通人家、新起的高樓豪宅，門口幾乎都供奉有土地神的牌位，稱為“門口土地神”。在澳門坊間，除了將土地神視為“地神”之外，同時亦視之為“財神”與“福神”。

有關澳門土地神信仰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拉蒙·拉伊·馬索（Ramón Lay Mazo）的《土地神》、^①喬森納·彼特（Jonathan Porter）的《中國的民間宗教與澳門的居民》、^②吳炳鈺的《澳門的土地廟和福德正神寶誕記趣》、^③譚世寶的《在澳門看明清以來土地社稷神壇的變遷史跡》、^④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初考》等。^⑤

童喬慧的專著《澳門土地神廟研究》（2010）通過實地考察澳門土地神廟和廣泛參閱相關文獻，透過不同的文化視角，較為全面地探討了澳門土地神廟的歷史緣起、文化內涵、空間坐落和建築樣式等。在此基礎上，作者還就澳門的民間信仰問題、澳門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澳門的城市建設與土地信仰、澳門土地神廟在現代化建設中如何發展等展開論述。作者認為，澳門土地神信仰之所以廣泛流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移民社會的無根性是土地神信仰發展的基礎，多元文化的共生是土地神信仰發展的平台，民間需求和統治者的宣導是土地神信仰發展的支撐。”^⑥

（五）其他民間信仰

哪吒是深受人們喜愛的少年英雄，是家喻戶曉的神話人物。在四川江油和宜賓、河南西峽、天津河西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哪吒都有着廣泛的信眾。鄧啟剛的《哪吒信仰的域外傳入與其在中國的本土化》認為，哪吒及其傳說隨着佛教的傳入而進入中土，不僅帶來了印度文化因數，也吸收了中西亞神話傳說。哪吒及其傳說傳入中國之初，面臨着文化衝突問題。通過佛教自身、道教、儒家倫理、文學藝術、民間方術等對哪吒的傳說、名稱、形象、神能、信仰方式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改造，哪吒被本土道教所吸納和改造，並為儒家倫理所接納。^⑦陳國成的《澳門的疫症與廟宇》探討了清末澳門疫症促成大三巴哪吒廟的興建，哪吒古廟與大三巴哪

① 拉蒙·拉伊·馬索（Ramón Lay Mazo）：《土地神》，良友譯，《文化雜誌》（澳門）1988年總第5期。

② 喬森納·彼特（Jonathan Porter）：《中國的民間宗教與澳門的居民》，雙水譯，《文化雜誌》（澳門）1992年總第10期。

③ 吳炳鈺：《澳門的土地廟和福德正神寶誕記趣》，《中國道教》（北京）2002年第5期。

④ 譚世寶：《在澳門看明清以來土地社稷神壇的變遷史跡》，《中國俗文化研究》（成都）2004年第2輯。

⑤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初考》，《華中建築》（武漢）2007年總第25卷第2期。

⑥ 童喬慧：《澳門土地神廟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頁。

⑦ 鄧啟剛：《哪吒信仰的域外傳入與其在中國的本土化》，《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綿陽）2014年第12期。

吒廟的關係以及兩廟分別主辦哪吒慶典、聖像出巡活動的社會意義等問題。^①陳氏另有“Temple Festivals,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Local Cult in Macao”（《廟會、社會與公共關係：澳門一種民間信仰的演變》）一文，以西方人類學視角，解析澳門哪吒信仰與外地宗教信仰聯繫的重要性。^②鄭妙冰的*In Search of Folk Humor: The Rebellious Cult of Nezha*（《民間幽默的探討——哪吒反叛精神的崇拜》）則有專章對澳門兩座哪吒廟和哪吒信仰作了概括性論述。^③陳學霖《澳門哪吒廟的歷史淵源與社會文化意義》則敘述了哪吒神的來歷及其形象的演變，考察了澳門兩座哪吒廟的年代和演變過程、廟宇背景與社區群體關係，進而探討兩廟所發揮的宗教社會功能及其呈現的民俗文化意義。^④胡國年《澳門哪吒信仰》主要介紹澳門哪吒信俗的起源、日常拜祭、賀誕禮儀及活動，重點介紹大三巴哪吒廟，並探討了澳門哪吒信仰之文化內涵。^⑤

1999年3月27日，澳門包公廟值理會、澳門歷史學會、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科教文中心聯合舉辦“呼喚廉政——包青天文化研討會”，其中與澳門包公廟及包公信仰有關的論文主要有楊仁飛的《包公廟與澳門社會信仰及社會變遷——關於包公廟歷史及宗教文化的思考》、徐新的《清官文化博物館——澳門包公廟建築文物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價值》及陳煒恆的《包公廟信仰淺談》等。

2013年1月21—23日，澳門理工學院、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和澳門海事博物館聯合舉辦“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展”暨“中國漁民信俗研究與保護”學術研討會，就朱大仙信仰和中國漁民信俗展開專題討論，取得重要學術成果。其中，朱天舒的《從港澳的譚公和洪聖大王談起——漁民信仰中的兩種模式》認為，譚公與洪聖大王兩種信仰反映了民間信仰中神祇形成與演繹的兩種模式：譚公信仰的形成代表民間的地方神可以向漁民神、行業神、宗族神、正統神等多元化發展的模式；洪聖大王則代表正統神在民間信仰中被再塑的模式。陳樹榮的《澳門的海神信俗》指出，澳門的海神信俗除媽祖（天后）信俗外，還有朱大仙、洪聖大王、東海龍王、三婆、楊爺、龍母、譚公、水上仙姑等，這些海神信俗與其他民俗一起共同構成澳門的城市記憶和本土文化。江淳的《淺談澳門媽閣神功戲》認為，數百年來，澳門華人每年在澳門媽神信仰的中心廟宇——媽閣廟進香獻祭、演戲娛神、為阿媽賀誕，已經成為澳門華人社會凝聚人心、保持傳統的重要節日，也是澳門華人力量逐漸崛起的重要體現。

此外，孟繁仁《澳門女媧廟瞻禮》討論了澳門女媧廟的歷史源流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中華“女媧文化”在澳門的流播等。^⑥程建軍則從建築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澳門康真君廟的建築風格。^⑦

① 陳國成：《澳門的疫症與廟宇》，《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香港）2003年總第32期。

② Kwok-shing Chan, “Temple Festivals,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Local Cult in Macao,” in *Berliner-China-Hefte*, Vol. 35 (2009), pp. 118-126.

③ Christiana Miu Bing Cheng, *In Search of Folk Humor: The Rebellious Cult of Nezha*, Hong Kong: Great Mountain Culture, 2009.

④ 陳學霖：《澳門哪吒廟的歷史淵源與社會文化意義》，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⑤ 胡國年：《澳門哪吒信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⑥ 孟繁仁：《澳門女媧廟瞻禮》，《文化雜誌》（澳門）2004年總第53期。

⑦ 程建軍：《澳門康真君廟建築》，《文化雜誌》（澳門）2006年總第60期。

亦有學者按神祇功能對民間宗教進行分類研究，如陳偉明在《近代澳門防災救災的社會應對（1840—1949）》和《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中，^①將媽祖、華光、康公等均視為災害保護神，從宗教角度出發討論了清末澳門防災的社會應對中在精神層面的應對。前者通過分析災害保護神的廟宇興建、重建、擴建，說明民眾以此種方式求得精神與心靈的寄託，增強對未來的信心；後者則從功能的角度對近代澳門民間災害保護神進行分類研究，探討其地域文化特色，進而分析信仰群體的文化行為，發掘信仰的心理安慰功能和文化功能。

四、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之探討

1576年澳門教區建立以後，耶穌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等天主教修會陸續在澳門駐紮，以澳門為基地，向中國、日本等地輸送傳教人員和物資。澳門開埠以後到康熙末年禁教前的百餘年間，澳門天主教得到快速發展，是澳門天主教史上的黃金時代，此時的澳門至少已經有了15座重要的教堂。^②明清時期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現象對華人的價值取向、社會觀念及政府治理產生了深刻影響。

明代後期，澳門經濟貿易持續繁榮，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在澳門或澳門周邊地區置產定居，華人開始顯示出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經濟發展能力。^③這一時期華人的自我組織和管理，以媽閣廟、觀音堂（普濟禪院前身）等華人寺廟為中心，形成神緣性組織，多數華人仍然持守中國傳統信仰。但加入天主教的華人也不在少數，據考證，1644年明清鼎革之際，澳門約有2萬華人教徒。^④

湯開建《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探討了明代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情況，並清單將華人教徒詳細分類。^⑤又在《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指出，17世紀開始，隨着進入澳門的華人人口日漸增多，澳門天主教修會尤其是耶穌會更加重視對入澳華人的傳教活動；而明清鼎革之際，澳門華人“在情感上有亡國喪家之痛，在政治上不願意成為異族統治者的‘順民’”，在這一特殊歷史情境之下，又有很多華人加入天主教，澳門在1640年代一度出現約2萬華人教徒。^⑥章文欽的《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徒》則分三個時期探討明清時期華人信奉天主教與澳門的關係，對澳葡政府吸納華人入教的政策以及華人奉教的動機、身份處境進行探討。^⑦盧金玲《明清之際澳門華人天主教徒研究》分析了澳門華人天主教徒信教的原因，認為華人進教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可以分為西洋傳教士的拉攏及誘惑、婚姻因

① 陳偉明、聶浩然：《近代澳門防災救災的社會應對（1840—1949）》，《文化雜誌》（澳門）2018年總第103期；陳偉明、李玉姬：《近代澳門災害與災害保護神研究（1840—1949）》，《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總第89期。

② 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第15頁。

③ 參見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④ 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第18頁。

⑤ 湯開建：《明代澳門地區華人居住地鉤沉》，《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⑥ 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

⑦ 章文欽：《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教徒》，《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素的影響、尋求好處及幫助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等主客觀因素。^①受乾隆十一年（1746）福安教案波及，澳門發生封鎖“唐人廟”事件，作為當事人之一，張汝霖撰寫了《請封唐人廟奏記》，對澳門華人入教原因作過分析。^②郭衛東的《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述論》、劉芳的《清乾隆年間查禁澳門唐人廟事件》則研究了唐人廟事件之脈絡及其與福安教案的關係。^③趙殿紅的《華人人教與政治博弈——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解析》認為，查封唐人廟是清朝禁教政策首次延伸到澳門的表現，事件牽出中方對華人教徒身份和信教原因的調查。事件當中，代表中國政府的香山知縣張汝霖、代表居澳葡人的議事會以及澳門教會等角色互相角力，反映出當時的澳門政治與宗教勢力的力量對比和觀念交鋒。^④

對於華人加入天主教與加入葡籍的關係問題，陳文源的《晚清澳門華人加入葡籍現象及原因分析》及何順標《晚清澳門華人入葡籍研究》均認為，^⑤入教不等於入籍，但入籍必然入教，入教與入籍的原因各有不同，在歷史上存在相互交織的過程。張澤洪的《澳門族群與多元文化——16—18世紀澳門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則分析了明清時期天主教的傳入以及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的人數、信教原因和信教情況，^⑥同時梳理了在此期間澳門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等中國傳統宗教的傳播與發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並探討了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的互動，以此論證多元宗教文化在澳門的相容共存。

關於基督新教，一般認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07年進入澳門，是基督教（新教）傳入澳門之始。澳門歷史上一直是天主教勢力範圍，基督教徒受到排斥，但澳門仍然不失為基督教傳入中國內地的策源地，基督教信仰也是晚清澳門華人信仰世界的重要層面。顏小華的《1980年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綜述》從基督教史的綜述性研究、傳教士與教會、印刷業與辦刊、教會教育與辦學、醫療活動、建築等方面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當中有一部分對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的基督教信仰亦有論述。^⑦如李桂玲的《澳門的宗教》、藍欽文的《澳門基督教簡介》、周大寧的《話說澳門——迎接12.20澳門回歸（六）》、劉先覺和許政的《澳門的宗教建築》、邱樹森的《略論明清時期的粵澳宗教文化交流》等，對明清時期澳門華人的基督教信仰源流、信仰狀況、教堂建築等進行了梳理和分析。

吳義雄的《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認為，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活動的初期，也是將澳門作為重要的活動基地。馬禮遜、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衛三畏

① 盧金玲：《明清之際澳門華人天主教徒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②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注》，趙春晨校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81頁。

③ 可參見郭衛東的三篇文章：《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述論》，《中西文化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乾隆十一年福建教案述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福州）2004年第7期；《中國官府與西方教會：1746年福安教案再研究》，《北大史學》（北京）2013年第1期。另參見劉芳：《清乾隆年間查禁澳門唐人廟事件》，《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2010年第3期。

④ 趙殿紅：《華人人教與政治博弈——乾隆年間澳門“唐人廟”事件解析》，《學習與探索》（哈爾濱）2017年第2期。

⑤ 陳文源：《晚清澳門華人加入葡籍現象及原因分析》，《澳門歷史研究》（澳門）2003年第2期；何順標：《晚清澳門華人入葡籍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⑥ 張澤洪：《澳門族群與多元文化——16—18世紀澳門天主教與中國傳統宗教》，《中華文化論壇》（成都）2004年第3期。

⑦ 顏小華：《1980年來中國內地期刊收錄的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綜述》，《澳門研究》（澳門）2018年總第90期。

(Samuel Wells Williams) 等傳教士，都有在澳門長期居住和活動的經歷。新教傳教士所舉辦的文化事業，特別是“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育會”和“中國醫務傳道會”的一系列活動，都與澳門有着密切的關係。^①湯開建、顏小華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考述了美國長老會海外傳道會於鴉片戰爭前後多次派遣傳教士前往澳門的歷史過程，他們在澳門開展佈道、學校教育、印刷出版等活動，制定相關傳教方略，為隨後進入內地的傳教工作做好了充分準備，從而使澳門自明代以後繼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②

澳門雖然是明清時期天主教、基督新教入華的策源地，但對澳門華人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問題，學術界長期缺乏持續而深入的研究，存在極大的學術空間。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的缺乏和多語種資料使用不足。未來以葡文為主的多語種原始文獻的翻譯和公佈，當可推動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

五、結語

在宗教研究方面，澳門是一個活標本，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更是一個饒有意義的課題，但迄今為止的研究十分薄弱。有關澳門華人社會的研究成果，即使關注到華人的信仰問題，要麼多流於掌故軼聞，要麼只注重宗教的“傳播與交流”研究範式，探討澳門與內地宗教信仰的互動關係，很少有學者能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研究這些宗教信仰與澳門華人社區組織、族群凝聚力、生活方式的關係，亦無助於人們理解澳門社會華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內涵。

首先，澳門華商熱衷組建以華人廟宇為中心的“神緣性組織”，其功能和作用需要深入探討。鴉片戰爭後，華人商業迅速崛起，其地位從附屬型轉向主控型，華商逐步成為晚清澳門規模最大、資產最多的群體。同時，華商階層作為澳門華人社會的精英群體，其社會作用日益突顯，成為華人風俗的引領者、華人利益的保護者、華人困厄的賑濟者和華人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在澳門宗法社會逐漸失效，商業社會逐漸形成的過程中，在華人社會承擔社會組織功能的，一是社團，二是廟宇。有關澳門華人社團的研究較為充分，而對華人廟宇社會功能的研究卻乏善可陳。林廣志認為，晚清澳門華人組織的功能性體現在華人之間的集合、對話、溝通、協調上，而華商組織的發展經歷過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媽閣廟、蓮峰廟為代表的神緣性組織；第二階段是以三街會館為代表的業緣性組織；第三階段是以鏡湖醫院為代表的慈善性組織；第四階段是以宜安公司為代表的聯誼性組織；第五階段是以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為代表的政商性組織。^③其中第一階段的“神緣性組織”正是華人廟宇社會組織功能的體現。除了林廣志舉例的媽閣廟、蓮峰廟、康公廟等華人廟宇之外，陳學霖還論述了澳門哪吒廟在華人社會中的組織功能。^④陳國成也以哪吒信仰為例，分析了澳門崇奉哪吒及舉行慶典對強化社區組織與坊眾關係的重要性。^⑤在華

① 吳義雄：《基督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早期文化活動略論》，《學術研究》（廣州）2002年第6期。

② 湯開建、顏小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中南民族大學學報》（武漢）2006年第1期。

③ 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④ 陳學霖：《澳門哪吒廟的歷史淵源與社會文化意義》，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⑤ Kwok-shing Chan, “Temple Festivals, Social Networks, and Commu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Local Cult in Macao,” in *Berliner-China-Hefte*, Vol. 35 (2009), pp. 118-126.

洋雜處之地，華人廟宇在保財祈福之外，應該另有深意，實際上掌管廟宇就是掌握了華人社會某一群體的話語權，因為在漫長的歲月中，在商業繁盛而商人組織未出現前，廟宇這種神緣性組織兼具了商人組織的功能和作用。

其次，澳門華人的宗教信仰應當置於中國華南地區宗教場景中進行考察。但除了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之外，現有成果的視域過於狹窄。而長期關注華南地區宗族、信仰的研究機構及學者，對澳門這個“表像單純，深層複雜”的人類學樣本缺乏持續、有效的關注。^①在這方面，程美寶從華洋交往中“小人物”的研究上做出了先例，其研究方法可作為研究澳門華人宗教信仰的參考。^②

再次，明清時期澳門從宗法社會向商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華人各種宗教信仰間的衝突與融合問題均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中國傳統的佛道及民間宗教與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澳門狹小的地域得以共處，在葡人社區以外，歷史上天主教的強勢並未導致其未來必然的獨大地位，中國民間宗教的香火反而比其他地區更為旺盛，這種歷史細節是如何發生的？需要有更多的學術成果來體現和印證。

最後，研究明清時期華人宗教信仰問題，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在澳門的延續、堅守與推陳出新十分重要。林廣志、趙林等學者已經關注到這種意義，前者撰文討論了晚清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問題，後者認為澳門與香港、台灣地區不同，澳門雖然具有多元文化共存互融的特點，但在民間社會始終保持着生機旺盛的“鄉土”氣息。^③

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下，澳門的族群、宗教都是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活標本”。“澳門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進程中的有價值的個案，只有從史學、哲學、宗教學、文化等多角度綜合研究，才能重新認識澳門的豐富內涵及其文化價值”。^④從現有的以考證源流為主的學術成果出發，將明清時期澳門華人宗教信仰與廟宇功能的研究推向深入，豐富和完善“澳門學”的學科內涵，是相關領域學者們的共同使命。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林明德：《澳門的區聯文化》，台北：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7年，第4頁。

② 程美寶：《澳門作為飛地的“危”與“機”——16—19世紀華洋交往中的小人物》，《河南大學學報》（開封）2012年第3期。

③ 林廣志：《衝突與交融——清代澳門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文化雜誌》（澳門）2008年總第67期；趙林：《澳門宗教文化的本土化特色》，《文化雜誌》（澳門）2014年總第91期。

④ 郝雨凡、湯開建、朱壽桐、林廣志：《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論澳門學的學術可能性》，《學術研究》（廣州）2011年第12期。